

我是幸运的

周小燕



MY GOOD LUCK

周小燕演唱教学生活四十年

目次

1988年7月出版

我是幸运的·····	周小燕 (4)
乐观的献身精神·····	张光年 (5)
我和周小燕三同·····	丁善德 (6)
良师益友·····	王品素 (8)
诲人不倦·····	陈铭志 (10)
话说当年·····	费明仪 (11)
我心目中的周小燕老师·····	林祥园 (12)
献诗·····	张利娟 (14)
我的老师周小燕·····	鞠秀芳 (15)
奋斗求索 锲而不舍·····	朱力勤 (17)

* * * * *

我的童年·····	周小燕 (20)
回忆我的父亲周苍柏·····	周小燕 (27)
我的学习·····	周小燕 (33)
周小燕艺术教学生涯剪影·····	倪瑞霖 (35)

* * * * *

男高音中声区和换声区的训练·····	周小燕 (37)
当代世界声乐发展趋势给我们的启示·····	周小燕 (41)
声乐人材培养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周小燕 (45)
对当前音乐演唱风格说几句心里话·····	周小燕 (48)
《丁善德艺术歌曲集》序·····	周小燕 (50)
《黄源尹论歌唱艺术》序·····	周小燕 (51)
在美国人民友谊的洪流中度过四十天·····	周小燕 (52)
深挚的怀念·····	周小燕 (54)

* * * * *

闲谈纪语·····	李凌 (55)
周小燕教授谈声乐教学·····	郑慕才 陈秀贞 (64)
关于美声教学的谈话笔录·····	冯季青 (66)
封面肖像·····	俞云阶

0510617

朱健

周小燕教授教学四十周年

周年纪念

朱健

一九九九年十月

为建立《左方
出而努力！
必能成功

周小燕

一九九九年十月

我们都来听

悠扬的歌声

小燕

是也
已重
十六

为人民服务

人民歌台歌，
是最光荣的称号，
为人民歌唱，而歌唱
人民吧！

为人民服务者，
拜人民为老师！

小燕同志

朱梅

一九四九年七月
北平

唱出人民的

心声

小燕同志

朱梅

我是幸运的

周小燕

当同志们考虑这本小册子的题名的时候，我坦率提出，就叫“我是幸运的”，同志们有些惶惑不解。是的，我的生活道路并不完全平坦，我的艺术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逆风恶浪。但我还是要说：“我是幸运的”。

首先我有一个好父亲，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创造一切条件，从小培养我踏进音乐艺术的大门，又教育我要为祖国献身。我有一个好弟弟，他很年青时就投身救亡运动，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他教我，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知道共产党是中国的指路明灯。我是幸运的，我在国内外学习期间，不断得到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 and 帮助，他们是我生活中又是艺术上学习的榜样。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从海外归来，眼见祖国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悔恨自己所学的东西无法为人民的解放尽力。我是幸运的，全国迅速解放，我被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我看到了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懂得了党的文艺方向，尤其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对我亲切的教诲和鼓励，使我看到了我一生该怎样奋斗的道路。

我是幸运的，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有一个理解我，支持我的伴侣，使我能够全力投入我的事业和教学。

是的，在我数十年的艺术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受过“左的干扰”，最后是恶梦般的十年浩劫，我进过“牛棚”，受过“批判”，直到被剥夺了我歌唱的能力。但貌似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十年弹指一瞬间，迎来的是阳光灿烂的春天！三中全会后，我满怀信心地重新走上教学岗位。我是幸运的，遇到了好几位奋发努力的学生，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国内国外的歌唱竞赛中获得了荣誉。我只是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点滴的经验。

我是幸运的，因为能长期在上海音乐学院这个国际闻名的音乐学府里工作。多年来我不断地得到同事们——很多是我的同学——的帮助。我是幸运的，在我任教四十年之际，正好是母校建校六十周年大庆，很多校友都返校庆祝，也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很多同事、同学更为我编辑这本小册子，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谨藉此向他们的盛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乐观的献身精神

一周小燕同志印象

张光年

我高兴地听到，上海音乐界、艺术界的同志们，要为周小燕同志七十大寿和从事声乐教学四十周年出一本纪念册。我想写几句话表示衷心地祝贺。

小燕也七十了！对这句话，我一时难以置信。这些年我们不常见面。在我头脑里，还保持着她那天真愉快的、热心快肠的、兴致勃勃的年轻艺术家的形象。今年十月，山东艺术节期间，我有幸同她在济南见面。逼视之下，虽不似当年风采，但一谈起青少年时代和建国初期难忘的旧事，又见她眉飞色舞，陶醉在令人神往的艺术天地中了。

小燕同志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声乐艺术家，对艺术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她当年的花腔女高音演唱是十分迷人的。我一直记得，她那深情的富于表现力的歌曲，曾使国内外很多听众为之倾倒。这些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许多富于献身精神的文艺家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小燕同志也不例外。这是很可惜的。但小燕依然保持着她那乐观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投身于声乐艺术的教学工作。她摸索出一套很有成效的教学经验，培养出一批批很有

才华的声乐良材。这次她到济南短期停留，还挤出时间，辅导从外地赶来求教的青年歌唱家。象当年醉心于自己的演唱艺术一样，现在醉心于培养声乐新秀。这种献身精神是很可贵的。

小燕同志的父亲，爱国老人周苍柏先生，曾经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艺术活动给予热情不懈地支持。四十年代初，我曾在他的细心照料下顺利逃脱反动派特务的魔爪。小燕的胞弟周德佑同志，抗战前夕曾参加革命的文化活动。抗战初期，随演剧队下乡从事抗日艺术宣传工作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每同小燕或别的同志谈起来，都深感怀念和痛惜。小燕少年时，也是从事演唱救亡歌曲开始走上艺术道路的。那时她才十七、八岁吧？现在七十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健谈健步健食，心境还那么年轻开朗，一点也没有老态。她盘坐在地毯上为我和黄叶绿同志作气功示范表演时，舞姿竟然是那么轻盈优美！我认为，这位艺术家其实还在艺术生涯的旺年，她定会做出更多更优异的成绩。我怀着尊敬的心情期待着。

我和周小燕三同

丁善德

周小燕和我有三同，这并不是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而是同学、同事、同志的三同。

在国立音专，我们是先后同学。1935年我毕业她入学。1947年她从法国留学归来我起程赴巴黎留学，是先后留法同学。在异国他乡，我们都得到著名作曲家齐尔品及夫人李献敏的热情关照和帮助。

1949年我们同时开始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生涯，成了同事。她是声乐教授我是作曲教授，不久她被任命为声乐系主任，我也当了作曲系主任。1956年3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4月也加入了共产党。同年7月1日我们都怀着无比喜悦和自豪的心情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样我们又成了亲密的同志。

解放初期，我们都对共产党十分崇敬，举凡党的号召，我们积极响应，土改时都下了乡，抗美援朝时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并各捐献一千发子弹的钱支援前线。政府要求大家认购公债，我和她买的数目在学校里是比较突出的。以后党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都积极参加，全心投入，对党表现出无限的信任和忠诚。

五十年代是周小燕作为歌唱家的黄金时代。她演出频繁，深受欢迎，《燕子》飞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我那时也是激情洋溢，写了不少较为成功的作品。我改编的新疆民歌《玛依拉》是她第一个演唱成功并传遍了全国各地，刹那间成为女高音的保留曲目。

十年动乱一开始，我们都被关进了“牛棚”。那时期我们真的实行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吃忆苦饭，周小燕难于下咽，同学们偷偷给了她一些糖，害得她挨批受斗的情景。

1978年我再次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她于1980年也被任命为副院长。这样我们又共同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献计献策，但我们都始终没有脱离教学。1984年我们又同时不担任行政职务，专心致力于教学工作。

作为教师，我们所化的心血都换来了足以自慰的收获。我们一样，都培养出了一批为学校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的优秀音乐人材。作为艺术家，她用歌声，我用作品为祖国服务，同时也都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人民的赞誉。作为学校领导，我们共同为学校的兴旺与繁荣作出贡献。

人世沧桑，命运各异、同窗学友，一旦跨出校门，大多人各一方，继而成为同事的为数并不多。在一起共事的，朝夕相见，便不以为奇。其实人生的聚合要别离散难得多，我至今才悟出这一点。今年是周小燕的七十大寿，又是她从音乐教育事业四十周年。想来奇巧，象我们这样从老音专出来，后来又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可谓难得。不仅如此，在事业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竟是那么相似，总是同时或先后跨出相同的关键的步子。我们的人生观、艺术观也极为接近或一致。因此四十年来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或意见不合。

我和周小燕的三同，无论是同学、同事、同志的三同或在“牛棚”里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都为我们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我们互相都未表达，却把这种可贵的友情深深埋在心中照不宣。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和事业上有这些巧合，难道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吗？人生确实有自己无能为力时刻，但我相信机会对人们常常是均等的。命运的不同往往是由于选择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主观意志。我们都热爱祖国的音乐事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刻苦耐劳奋发图强的坚定意志，这

些共同的性格和特点把我们联系起来，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周小燕已经七十高龄了，她年轻时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歌唱的劲头，並沒有衰退，现在又把整个身心都投入教学之中，承担了十几个学生的教学任务，每天大部份时间都是在课堂里度过的。性格对人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周小燕为人热情开朗。1947年我上门向她了解一些法国的情况，这以前我们未曾相识，她不厌其烦地向我讲了她所认识的法

国，从此给我留下了“热情”的印象。文革中，她一出“牛棚”，就一头扎进教学中，毫无怨言，硬是作出了成绩。这样看来，我们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忠于事业、乐观向上的一条共同道路。

我们已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大半人生，有了成绩，也有荣誉，但这已成了过去，愿周小燕，也愿我自己，不断循着理想的呼唤，开拓、进取。

良师益友

一我所了解的周小燕同志

王品素

正值我国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同志执教四十周年暨七十寿辰之际，回忆我们相识及相处近四十年的日子，我感到有责任把我所了解的周小燕同志写出来，以激励我们的后人。

我认识周小燕同志是在1948年她回国后的第一次独唱音乐会上。因为久慕其名，我专程从南京匆匆赶往上海。票子买得不理想，是兰心剧场（现在的上海艺术剧场）楼上后座。音乐会开始了，场内鸦雀无声。我一字一句地捕捉她那清晰、纯净、优美的歌声。歌声是那样地迷人、动听，她是用整个心灵在歌唱！我渐渐觉得坐得离她并不远，而是越来越近。她唱的什么歌到现在我还能记起不少，特别是勃拉姆斯的《我的呻吟更形低微》，歌剧《弄臣》中吉尔达的咏叹调《亲爱的名字》，还有一组法国浪漫派作曲家的作品和云南民歌《桃花村杏花店》（记得当时节目单上印的是《美酒美人》）等等，她的妹妹周徵佑为她伴奏，合作得相当默契，这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独唱音乐会啊！

两天后，我的第一位主科老师洪达珪先生带着我去华山路周老师家探望她，这次会见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周老师与她的父亲银行家周苍柏先生，母亲董燕梁女士及三个妹妹同住。我们去时周老先生不在家，她的母亲招待我们。她是一位慈祥、厚道、好客的长者，（听说周老师出国后，她的家里还经常住着一些音乐家，如巫一舟、江定仙等老师）他们住的是一幢花园洋房，据洪老师说是借别人家的，环境很不错，屋子里的陈设却很简朴。周老师平易近人，因此我虽是初次和她见面，却并不感到拘束。

1956年周小燕老师入了党，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这时我才了解到她的二弟周德佑是位中共党员，抗战初期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周德佑同志认识了周苍柏先生，中共代表团决定把当时海内外对我党的捐款托周老先生暂存湖北省银行，以便送往根据地和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德佑同志后在应城不幸因病逝世，周副主席、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亲自出席了新华社为他在汉口主办的追悼会。后来武汉失守，中共代表团迁往重庆，周苍柏先生全家（周老师和和大多到法国留学）也迁到了重庆，苍柏先生与中共代表团的联系一直未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周老师回国后，就到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教课。后来，才应聘担任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的声乐教授。当年有才的老同学告诉我：“周先生这样的名人肯到育才去教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育才的老同学们谈起来还很激动。”

1950年本院成立音乐工作团，周小燕同志任团长，任贤璋同志任副团长，我担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周老师对人对事都很热情，没有教授和歌唱家的架子。她和音工团的团员们一起到松江县参加土改，住在贫农家里，一起到山东老解放区惠民等地去慰问老区人民；有时还一起到上海街头、剧场宣传党的政策；一起到剧场演出。她既是团长，又是普通的战斗一员。

周小燕同志在解放后参加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文革前历届人大常委会都被选为代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是全国政

治协商会议委员，多次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上海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是历届文代会的当然代表。她总认为自己没有为人民做多少工作，而党却给了她很多荣誉。1956年她入党时这么讲，当她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时又这么讲。直到现在她已是桃李满天下，有些同学在国际国内获奖，为祖国争得了许多荣誉，她还是这么讲。

对新生事物周老师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扶植，如她的学生鞠秀芳老师，学生时代就酷爱民族声乐。周老师常和鞠秀芳一起上榆林小曲课，并主动提出与教榆林小曲的丁喜才老师联合教学，从而培养出了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歌金奖获得者鞠秀芳。又如民族班成立后，她积极支持，对民族声乐，应该走什么路子，她提出了具体意见，并且她还亲自教了维吾尔族、彝族、回族四个学生，热比亚就出自她的门下。做为系主任她亲切关怀、爱护这个专业。当党委决定由我来负责民族班教学时，周老师就鼓励我从事民族声乐教学工作。每当取得一些成绩时她就及时给予肯定，而当她认为有问题时就即刻提醒。周老师和其他老师对我的学生才旦卓玛，何纪光等同学的肯定，更坚定了我从事民族声乐教学的信心。

近几年周老师几次在系委会上提醒大家，声乐系同学应该唱好中国歌，而老师们更应充分认识它的意义，我认为这些提醒是很及时的。

记得五年前校庆五十周年时，声乐系曾召集来校参加校庆的老校友开座谈会，征求校友们对我系

教育上的意见。当时，主持会议的周老师，除了代表声乐系向到会的校友对过去和大家联系得太少表示歉意之外，还讲了很多过去教学上的不足，请校友们对今后如何和校友联系，如何改进、提高教学质量等，向声乐系提出宝贵的意见。不少校友对这次座谈会深有感触，感到周老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认为有了这种精神声乐系就能够办得好！一些过去直接受教于周老师的校友，他们向我赞美周老师：没有名人架子、教学上循循善诱，从没有因为学生唱不好而对同学发脾气。她还善于用各种办法形象地使同学理解她的要求，达到教学目的。在教学上她也从不保守，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近年来周老师教学上可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常常在上午一个学生接着一个学生地上课，直到中午一点半钟左右。有时一点半钟开会，只见她啃着面包乐呵呵地走进会场，告诉我她刚上完课。我几次劝她课不要赶得那么久，要注意休息。她并没有接受我的劝告，有时累得发烧、晕倒，但只要稍好一点就来学校上课了。她不知疲倦地教学，是为了多出人材、快出人材，为祖国的声乐事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两个文明建设无私地奉献。

在周小燕同志教学四十周年暨七十寿辰之时，祝愿她健康长寿，为祖国培育出更多的声乐艺术人材。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海人不倦

陈铭志

我有幸亲耳聆听周小燕教授教诲，是三十六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作为新生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一届毕业生初涉乐坛。1950年底，我奉命由本院音乐研究所去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并随上海市组织的华东文艺工作调查团，前往山东的济南、青岛、惠民等地慰问演出。以前在校学习时，虽然在贺绿汀院长的教授下学了一些民间音乐，对胶东半岛与渤海地区的民歌还算熟悉，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很有信心。因为我对这个新单位的情况不太了解，过去没有合作的经验。再加上这次准备的时间短，因此对于能否很好的完成这次政治宣传任务，我的心里总不免觉得有几分不安。当我带着这样的心情，跨进音乐团的大门时，使我惊讶的是周小燕教授竟然亲自前来接待我。那时她早已是蜚声国内外的著名歌唱家了，这次去山东她又担任了调查团的领导，其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的繁忙可想而知。但她却从百忙中抽出空来，向我详尽地介绍音工团成立后的种种情况，使我倍感领导对我的重视和信任。接着，周先生又带我参观了团里的排练场和宿舍，并安排解决我的生活和食宿。因而先前存在在我身上的那种心理负担，顿时烟消云散了。

周先生虽在法国深造多年，但她对中国传统舞台表演艺术却非常熟悉。她经常指导演员排练和歌唱，并不时亲自示范。在她的带动下，大家学得热火朝天，非常起劲，很快就学会了不少独唱、重唱、合唱以及富有地方风格的折子戏诸如《双看相》、《夸女婿》等。

对我的创作，周先生总是很直率地发表她的意见。当时我写的《送军粮》中有个别的词句演员们不容易唱清楚，周先生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还记得，有一段歌舞音乐的高潮处理，就是受到她的启发才顺利解决的。她总是要求我们在创作上一要

内容充实，二要优美动听。她还一再告诫我们说：“作曲家搞创作，一定要想到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曲子”。她对我们每次排练提出严格的要求，从不马马虎虎、掉以轻心。周先生对艺术的严谨态度，留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音工团与其它文艺团体合并，周先生回校担任声乐系主任，我也回到作曲系教书，直接聆听周先生的教诲机会相对就少了。所谓隔行如隔山，这一隔就是十几年。但每当我和学生们的研究新作时，就会想起和周先生在音工团相处的那些日子。

前几年，我的几个学生的作品请声乐系的同学们试唱，那时我已担任了作曲系系主任的工作，而周先生已经退居二线了。但她仍然是那样热情地帮助我的学生们提出这样、那样的修改设想。作品经过她的指点，音乐整个儿就活起来了。我觉得周先生跟从前一样地诚恳和热心，几十年的坎坷岁月并没有使她有什么改变。

中国古语说“海人不倦”，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如果没有对艺术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是决不可能象周先生那样，不论是本行的学生还是隔行的学生，不论是份内还是份外的事，始终几十年如一日，热情地扶掖着后来人。正是这种海人不倦的精神，才使周先生在培养声乐人材方面有若辉煌的建树。

愿我们永远有幸聆听周先生的教诲，同时也象周先生那样努力做到海人不倦。

1987年12月22日
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话说当年

费明仪

话说当年我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黄毛丫头，虽然刚念完小学升入初中，却是胸怀大志而满腔理想，爱好文学、醉心戏剧之外，对音乐尤其有一股狂热。起初想学作曲和指挥，不过，最后终于选择了钢琴，并幸运地得到我的启蒙老师丁善德教授的悉心指导。

音乐的天地是如此广阔，既然立意要做一个钢琴家，每天下课回家做完功课，我就忙于练琴；逢有精彩的器乐、声乐或交响乐的音乐会绝不愿错过。有一天我到兰心戏院（即今之“上海艺术剧场”）去听当年乐坛声乐界四大名旦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之中的“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独唱音乐会。记得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身材不高，银色长旗袍、配上同色的高跟鞋，淡施脂粉、仪态高雅地走出了台口。独唱会的曲目编排格调高而多采，包括中国歌曲《长城谣》（刘雪庵）、阿梁比耶夫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夜莺》等等。而最后压轴节目选自法国歌剧《曼依》（Mignon）中仙女之王的咏叹调《我是第塔妮亚》，演唱者以丰富的音乐修养和纯熟的歌唱技巧，使座上听众如痴如醉。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独唱会获得空前成功，但是音乐会散场之后，黄毛丫头没有胆量和勇气到台上去向她——我们的周老师道贺，她不知道在听众之中又多了一个仰慕者，她的演唱不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更为我在若干年后，由钢琴转声乐为主科奠定了启发。

不久，我们举家南下，由上海移居香港。

一九五六年，我准备到法国去继续进修音乐的前夕，周小燕老师随“中国艺术团”来香港演出，报纸要我负责与访问专稿，我才第一次有机会正式认识周老师。当时对我来讲，这可实在是件大事，

不过可惜由于兴奋过度，我只能在棚里糊涂，语无伦次的状态中完成任务。事后每次提起这次访问，周老师还一直说：“那时你好乖哟，总是笑咪咪的，细声细气的说话。”

一九七八年，“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美演出经港回国，周老师是副团长，我又在香港第二次见到周老师，和前次的会面，时隔二十二年。限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代表团在一个大厅里，三、两成群地各据一角，实行集体会客，虽是闹烘烘的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在讲些什么，但大家的心情愉快而激动。阔别多年周老师头发略显花白、很瘦，但精神非常饱满。熬过了牛棚里孤寂和漫长的黑夜，她说自己已不再唱歌；经过一场空前浩劫之后，必须集中精力培养新一代，重新再为祖国的音乐文化撒耕耕耘。

离家二十四载，一九七九年秋天回上海探亲，在上海音乐学院第三次和周老师见面，自此以后才真正开始了我们的交往。周小燕老师数十年如一日，毫不松懈地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无论作为一位演唱家、声乐教授，她的认真不苟和热心快援后辈的态度，受到尊敬，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推动音乐事业方面，周老师的精明能干和灵活的外交辞令都让人心折口服，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周小燕老师今年七十岁，但是我相信她是不会服“老”的。什么“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的话对她根本不合适。腰酸背痛算不了什么，她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她似乎整天有做不完的事和问不完的问题，不只对音乐，凡属任何新鲜的事物，周老师都会有兴趣，并且充满好奇，经常听见她在问：“啊，真的，为什么？……？”

衷心祝贺您，周老师！

1987年10月于香港

我心目中的周小燕老师

林祥园

“美丽的夜晚，明亮亮的小月芽天上挂
百灵鸟儿，快快活活轻声唱起歌啦，
哎咕嘎咕……你这美妙的歌声，啊……”

最后一个高音还没唱完，热情的掌声火山爆发似的响彻了偌大的上海文化广场，久久不停。身穿黑丝绒晚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带着亲切的微笑向观众深深鞠躬致意。

那一刻，令我回忆起在印尼念小学时，先是从男高音歌唱家黄源尹的口中知道周小燕的名字，后来又从唱片中听到她唱《红豆词》的歌声的情景。她唱得是那么地细腻动听，水乳交融的声音与情感是那么深刻地体现了作品的词意和曲情，虽然当时自己年纪尚小，可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位歌唱家和这位歌唱家所唱的《红豆词》，并且梦想着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周小燕那样的歌唱家。

很幸运，一九五七年我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预备班，一九五八年正式进入声乐系本科一年级学习。更令人高兴的是开学不久，学校就让我参加到由周小燕教授率领的慰问团，去浙江海防前线为解放军指战员演出一个月。周老师除了担任团长外，还要表演独唱节目，并指导男、女声小合唱及全部声乐节目。每次排练她都亲临指导，要求又高又严。作为初级新生的我，少不更事，甚好出风头，有机会单独表演时，就必定动作多多，事后才知道这实在是肤浅得很，下乘得很。周老师目睹我的这种演唱方式后，便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耐心的开导，并逐字逐句地纠正我的错误和不恰当的地方。经过一个月的排练和演出，周老师终于使我这个小學生开始懂得了唱歌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以前所想的那样简单：“唱歌嘛，只要有嗓子、有本钱、拉开喉咙唱，不就行了！”

从小就羡慕和崇拜歌唱家周小燕，现在竟然能够跟她同台演出，同桌吃饭，并住在同一个军营招

待所里前后相处一个月，从心底里早就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拜她为师。终于在念二年级，主科遇上最困难的时候，周老师毅然收我到她班上学习。记得上第一堂课时，她是这样对我说的：“跟我学，可要约法三章。一是要完全照我的方法去做，做不到或做不好不要急，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问清楚；二是绝对不许从别的老师处试用其他方法乱唱；三是不准私下跟着唱片乱学。要彼此互相信赖、合作，希望能把你教出一点成绩来”。当时我是系里非常棘手和难教的一个困难学生，周老师肯收我为门徒已是谢天谢地。区区的约法三章算得了什么呢！只要能跟周老师学习，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哪怕是约法几十章，我也会点头不迭答应下来。头三个月周老师只给简单的“a”母音练习，不练高音，也不给歌唱。到第四个月才给些精确的练习，并偶而碰碰高音a²或降b¹。当我第一次把a²唱出来时，心情之兴奋是无法形容的。为了培养我对集体的责任感，周老师要我当上了她的声乐班的班长，负责分配安排各同学上课的时间。而我居然谦让，把自己排在上午的最后一堂课。这堂课要上到中午十二时左右，由于正是腹中最空虚的时候，而唱歌又需要力气，所以一般同学都不愿在这个时候上课。其实我也不是有自杀牺牲的精神，而是周老师清楚了解我这个学生向来嘴馋好吃，肚子一饿就唱不动，因此就把这堂课放在她家里上（周老师家离学校很近），当我唱不动时，就叫保姆开饭，让我饱餐一顿之后再继续上三刻钟。正因为这样“同学们称我是周老师的“独养儿子”，一则是由于周老师对我的这种“厚爱”，二则是因为周老师班上的学生全是女生，仅我一名男生。在跟周老师学习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周老师对我唱中国歌曲的严格要求。她要我把所唱的歌曲中的每一个字都详尽地注上汉语拼音，对

我这个讲国语带印尼腔的华侨学生，这个要求实在比学习意大利语还要困难。除了汉语的四声掌握不了外，唇音、齿音、舌音也分不清楚。于是只好一字字、一句句地去笨做，经过天长日久的努力，终于在聚沙成塔的积累中，奠定了我演唱中国歌曲咬字、吐词清晰，发音部位准确的扎实基础。如果说，我今天能在演绎中国作品方面有些微小成绩，这都是由于周老师当年教导有方。而更重要的是她曾不断提醒我：作为一个声乐学生，应努力追求高

格调、有个性的演唱和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去一味模仿别人的方式，更不是“出绰头”，以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代替演唱的基本目标。周老师的谆谆教导，言简而意深，它是我们应该紧记的座右铭。

最后我谨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我心目中的周老师，是教会我唱歌的，指点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好老师”

1987年10月23日于香港

（上接第14页）

到处都有您的桃李在芬芳吐艳；
或是在国际舞台上抖擞中华儿女的声威，
或是手捧着金灿灿的奖牌高歌凯旋。

啊！您四十年的功绩，
岂是我笨拙的笔所能评点！
但我知道

您是一棵经风沐雨的大树，
您是声乐园丁中的模范。
我愿象您一样，
去忘我工作，去奋斗不懈。

敬爱的老师，
我衷心祝福您——
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不断把更浓郁的春色，
献向祖国姹紫嫣红的声乐百花园！

1987年10月于北京

献诗

张利娟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我多么渴望唱一首动听的歌，
让它化作一片绿叶，
轻轻飘向您的身边。
可是翻开所有的乐谱，
却没有一首能表达我的心愿。
这支歌，只有用我自己的笔，
用最朴素最真挚的语言来书写。

您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您谆谆教导每个学生，
终生铭记为祖国歌唱的誓言。
您不仅引领他们进入艺术的殿堂，
更向他们指出生活的广袤无边。
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的学生年代，
是您给我力量和信心，
使我能迎着困难阔步向前。

您是我的良师，
又是我的益友。
不论欢乐还是忧伤，
我都向您敞开我的心田。
您一心扑在教学上，
忘却了自己的年令和时针的回旋，
多少次您在教室的钢琴前一坐就是半天，
中午只啃几片面包或干点。

辛勤的耕耘永不停息，
勇敢的探索年复一年。
山南海北，大洋彼岸，

(下转第13页)

我的老师周小燕

鞠秀芳

1950年夏，我手持上海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来校报到时，学校已上课了。老同学陪我去注册，告诉我有权可以选择主科老师。注册后，我领到了一张可以填写三个志愿的小表格，由于我在到上音之前曾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学过声乐，我的启蒙老师姜琛曾对我说过，如果你能考上，最好是跟周小燕教授学习。因此，三个志愿我都填了周小燕教授。可是由于周先生班上名额已满，系主任洪达琦先生要我另作选择。我因对别的老师全不了解，新的选择无法作出。约摸过了十多天后，洪先生又找我，并告诉我苏石林先生已受聘来系授课，系里决定让我到他班上去。我大哭了一场，但因周先生班上一时进不去，我只好听从安排。

苏先生是一位很有经验，並享有盛誉的老专家，要说他对我也真够耐心的了。他是俄国人，上课讲英语，而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英语水平，老先生跟我说话，比手划脚，我还常常误解他的意思。给了我一首意大利歌曲《Caro mio ben》（《我亲爱的》）我始终没唱给他听。因为我不会意大利语拼音。先生不教，我又不愿请教别人。结果，一个学期唱了大半本孔空（Concone）的《五十首练声曲》。学期结束临时找了一首中国歌才把考试对付过去。这怎么行呢？我对洪先生说，並坚持要跟周先生学。洪先生被我缠得没法，只得答应暂时由她代课，等周先生什么时候有空教我时再正式转过去。

我长在苏州，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她虽没有文化，但非常喜欢看戏，特别爱好京剧，自己还会唱几句。后来她生病卧床不起时，为了排忧解难，常把街上卖唱的艺人请到家里来表演，受到她的影响，我自小对京剧和江南地区的民歌小调比较熟悉，我喜欢唱歌，但小学、中学里都没有音

乐教员，只能从别人家的收音机里偶而听到一些、学会一些。我最喜欢听周小燕先生唱歌，她唱的《长城谣》、《红豆词》、《青年参军》、《五朵花儿开》我都会唱而且学得很象，我就是唱着《青年参军》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因此，我对周小燕先生的倾慕是由来已久的。

进校后，当我亲眼看到周先生那矫健的身影、亲切的笑容、朴素的衣着时，更使我崇敬不已。特别是她的演出，以及每次节目中少不了的几首民歌，那熟悉的音调，动听的歌声，感人的激情，都象磁石一样把我深深地吸引。我真希望自己能那样唱。

解放初期，贺绿汀院长曾亲自带领我们学习民族民间乐。当时学校作出规定，要求学生必须每天背诵三首民歌。面对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宝库，我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之情与日俱增。在演出实践中吴国钧和我对唱的东北蹦蹦戏《全家光荣》深受群众欢迎。但当时对民族声乐的研究尚未展开。那时唱民歌，女声大都用大本嗓。而我从小受京剧青衣唱法的影响，习惯于用小嗓。后来学声乐、接受欧洲传统的唱法训练，属抒情花腔的嗓子。因此当我用自己习惯的唱法演唱民歌时，一开始就遭到非议。有人说我的声音“真不真，假不假，土不土，洋不洋，只有一点含糊，就是不是学院所要求的样子，不符合声乐系表演规格”，而校外又有人说我是“假嗓子”、“洋嗓子”。总之，这样唱不行，唱民歌更不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学习上遇到困难，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调到周先生班上去的。

首先，我得到了周先生的热情支持。她鼓励我说：“你唱民歌很有味儿，群众喜欢听就要坚持下去。”同时，也向我指出，“光注意风格、感情，

不顾声音不行，唱法上要想点办法。”以后她就让我把要唱的民歌，带到课堂上去，由她带着一字一句地练。

1953年我跟丁喜才老师学榆林小曲。1954年我灌制了《五哥放羊》的唱片后，得到各方面的鼓励与支持。周先生及时发现我在演唱榆林小曲方面的优势，因势利导，决定把榆林小曲作为我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

周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歌唱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声乐教师。当时她教我这样的学生是破天荒地头一次。但她热情谦虚，敢于打破陈规。为了帮助我唱好榆林小曲，她经常把丁先生请来一起给我上课，一个把发声关，一个把风格关，后来我唱苏州民歌时，周先生也常把朱慧珍老师请来共同磋商。至今，丁先生回忆当年和周先生一起教我的情景时，还深有感触地说：“象周先生这样的专家、教授，如此谦虚、认真，实在罕见并令人敬佩。”

对我来说，唱民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除了舆论的压力外，在具体的发声方法与风格表现上，也是问题很多，困难重重，生搬硬套既不行，盲目模仿也不行。周先生除了不断鼓励我之外，要我坚持植根于民间音乐的土壤，坚定地走民族声乐演唱的道路，发挥个人所长，走出自己的路子来。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民歌手，我的民间音乐根基并不深。因此，我比真正的民歌手更需要学习。而另一方

面，我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在文化和音乐修养上有着一定的基础。因此，系里安排我帮助民间艺人老师记谱和整理教材，使我能比较系统地学得更多、更深。在声乐课上，周先生除了对我进行必要的技巧锻炼外，又根据我嗓音和发声上的具体情况，专门为我编了不少中国旋律和带字的练习。一再说服引导我要很好地学习吸取欧洲传统唱法中的科学部分，如气息流畅、喉头稳定、共鸣效应显著等，一方面帮我分析斟酌怎样更恰当地把我国戏曲、曲艺中的吐字行腔与韵味，结合运用在民歌演唱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终于踩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民歌手，这是和周先生的支持、努力分不开的。

除了我之外，周先生还培养了不少民族音乐人材。在声乐系，她曾带头种“试验田”，培养民族民间演唱专业的学生。她是音乐学院教师中探索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结合，进行教学实践并取得成功的先行者之一，为上海民族声乐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先生是我的老师，长期来对我的成长倾注了无限的关怀之情。而且直到今天我仍能经常得到她的教诲。“种子下地要发芽”，作为周先生的学生，我愿自己也能象她一样，把为祖国培养更多合格和优秀的声乐人材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上接第19页）

教授又开始奔走了。她打算辞掉一切行政职务，搞一个歌剧艺术培训中心，集中全国音乐院校声乐系的优秀毕业生加以训练，为国家贡献一批歌剧人材。可是缺乏场所，缺乏资金，缺乏师资，并且“中心”无权授予学位。

难啊，困难重重，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使用问题，人材制度问题一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然而，在困难面前，周小燕教授并没有止步、

气馁，她继续为发展音乐事业呼吁着、争取着，她继续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忘我的奋斗着。“我今年已经七十岁，能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我初步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争取再为国家培养两批高质量的声乐人材！”

她依然精神矍铄，瘦小的身躯内充满了无穷的活力。